

李敖批判

# 批李敖

K·P 著

11  
0

1112  
L 2  
060

李敖批判·批判李敖

1981, 4, 22

H

---

## 李敖批判・批判李敖

著作者：K.P

出版者：大千文化出版社

台南市南門路159-4號

電話：(062) 232338

發行證：行政院新聞局

局版台業字第0583號

發行者：葉燕青

總經銷：橋樑雜誌社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30巷36弄5號

服務電話：7728207

郵撥帳號：165388

排 版：五湖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3821234・3821235

定 價：新台幣 60 元

中華民國 65 年 7 月初版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 目 錄

●	每個人的文章都很好（代序）	一
1	中國知識份子摸象	一九
2	不要我說，我偏要說	二九
3	雜貨店老板的另一批貨品	三七
4	楊玉環遇人不淑	四七
5	對娼妓問題的不同觀點	四九
6	不吃素的人生哲學	六一
7	奴隸的吶喊	六五
8	爲他有那樣的敵人而愛他可以嗎？	七三
9	床上功夫與周公東征	七七

●	15	14	13	12	11	10
登不登我的廣告？	老夫子的音樂早就立正了	大公無私的「性觀念」	歷史人物的評價	吃人的人被人吃	郁達夫的激動	結尾
.....	.....	.....	.....	.....	.....	.....
七九	八五	九三	一〇五	一一五	一二九	一四三

## 每個人的文章都很好（代序）

「文章千古事，下筆一字難。」這是古代文人寫了好文章之後自我標榜的口頭禪。其目的在於「唬人」，教別人不敢再寫文章，尤其是不敢「付梓」，只敢撕稿紙，這也許正是中國文明還不很進步的原因吧！

大家都聽過這樣一個故事，說：「賈島寫了一首好詩；叫做『題李款幽居詩』，詩裏面有兩句是『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寫得真好。有一次他騎在驢子上，經過洛陽皇城大路的時候，又想起了這兩句詩來，總覺得（推）字有考慮的必要，一邊走還一直比手劃腳作一推一蔽的樣子苦思。事情讓韓退之知道以後，才替他捉刀，幫他決定了（蔽）字。」這件小事，傳為千古美談，老夫子們津津樂道，而且美其名曰：「推蔽」。「推」得好？「蔽」得好？我們不用管，但是賈島如此費心勞神地考究文章，也沒什麼了不起，因為他寫的東西，在中國文學史上並沒有多麼特殊的地位和成就，只不過敢「寫」罷了。

所以，我集二十餘年究研中國文學的經驗，得到了一個中肯的結論，那就是：

文章好不好就看你寫不寫。

簡單地說，所謂好文章，就是「寫」，寫了自然好。不寫，連文章都沒有，怎麼會有好文章呢？

有些人，空口說白話，只會清談，沒有行動，閒談之間，爲了表示自己也有「文學細胞」，便指張三的文章不好，李四的作品不夠水準，古代的文章不行，現代的作品沒有深度，結果是他（她）自己爬進了棺材，還沒有發表過一篇大作。

另外有一部分人，門縫裡看自己，不，我應該說：「妄自菲薄」。他（她）老是說別人的文章寫得好，不但太史公的史記好，曹雪芹的石頭記好，就連李敖的「獨白下的傳統」也是很好很好。這種人，我遇見不少。我說：

你也可以寫一點好東西讓大家瞧瞧。

他很客氣：

我不會寫嘛。

親愛的小朋友們，我的知己王平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認爲是），他說：

世界上，任何美好的存在，都基於你本身的存在。

孔子、孟子、韓非子、蘇格拉底 (Socrates)、盧梭 (Rousseau)、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有你 K·P 這個人，他們才能夠在 K·P 的心目中偉大，如果沒有你，或是你不能 (無法) 去體認其思想之存在，他們便無價值可言。

當然，我絕不是愚不可及的傢伙，我絕不是可以任意被王平牽着鼻子走的大象。我知道，他的這種論調，只不過是法國人笛卡爾 (Descartes 1596—1650) (我思故我在) 的翻版，充其量也只是「我思故人在」的純「唯心主義」(Idealism) 的玄想而已。當然，玄想日久，免不了要精神分裂，俗語說的「神經兮兮」，大概指的就是這種人吧！我的朋友王平是一個悲哀的角色。可是，讓我們現在停止玄想，開始實際的想一想。

爲什麼司馬遷會成爲「司馬遷」？

曹雪芹爲什麼會成爲「曹雪芹」？

而李敖先生又爲什麼能夠成爲「李敖、李敖、李敖」呢？

這些，都已經不再是「玄想」所能管得住的了。K·P 認爲，這是社會文明蛻變的結果。說到這裡，我必須聲明一點，我並不是想假手於哲學理論以分割剖析人類的歷史，而只

要證明人類歷史過程中所產生的現象，並不一定是人類本身實力的表現，並非是人類（某一個人）才智的個別成就。而且，這種成就，除了個人的才智之外，還有「命」的因素在內，「命」，善男信女名之曰：「八字好」，名之曰：「姓名取得好」，名之曰：「手板心的掌紋好」。而知識份子名之曰：「時勢」，名之曰：「機緣」。總歸一句話，一個人在社會上大有成就，命好就成了因素之一。

舉例說罷，司馬遷之所以名垂二千零八〇餘年，是因為他寫了一部「史記」，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人寫過這樣字多的文章（史記有五十二萬到五十三萬個中國字，加上標點符號，接近百萬無疑。），孔、孟、老、莊皆「莫能望其項背」，這是事實。老夫子們崇拜他，說他有才華，但是，忘了說他命好。K·P很明白這一點，因為一九七〇年代寫文章，動輒數十萬言，數百萬言的人多如牛毛，司馬遷如果生之於一九四一年，不幸與K·P同庚，則其名安在？其才華又將如何？而且，司馬遷的名氣比李敖大，李敖寫的文章未必比司馬遷少，是不是？所以，司馬遷之所以為「司馬遷」，少關才華，而多關乎「命」也！

曹霑（字雪芹）之所以二百五十年來硬吃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界的老夫子們，便因為他的「石頭記」破了中國白話小說的格，以「前無古人」的氣勢出現（有關這些，K·P，李敖

胡適之，蔡子民、林語堂等都十分明白，不必多說。其實，在我看來，這也是「命」，如果曹霑生在孔夫子的時代，用刀子刻竹子，一部「紅樓夢」如何刻得？不說「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就算是「寫了三十年，刻的全是草稿」，恐怕也不可能辦得到，是不是？如果曹雪芹生在今天，那本「金陵十二釵」會出奇嗎？絕不可能，因為台北的社會言情小說有多少？多如過江之鯽。「石頭記」丟在書攤上，充其量只是一本小說罷了。所以，K·P認為曹雪芹之所以光靠一部章回小說便吃香了二百多年，這也是「命」，命中註定。

至於說到「李敖、李敖、李敖」，那個學問，可就大了。因為按照人類進化之原則而言文化之進步，乃由於文明之累積。因此，文明之累積量越多，則文化之成就越大，這是一種樂觀而合理的看法，事實上也是如此。問題出在當人類進化歷史延長了一定的時間之後，其文明產物亦隨著累積量而達到了一定的限度，甚至於形成過剩現象，對於後來的青年才俊來說，就很不幸，因為他們失去了「創造」的機會。很多的後生，有了玄想，有了創造的動機，正要下手去寫的時候，有一天他的老朋友約他去逛西門町，他倆買了一本書回來，他因此完蛋了，他的玄想破滅了；因為他的一切玄想就在他買回來的這本書上，說得清清楚楚，明白明白。他不得不結束自己的「創造」。這對他而言是一種幸運，因為他沒有浪費寶貴的青

春去寫一本觀念、思想和別人雷同的書。另外的一些人，寫了一半才發現自己在寫「別人搶先」發表的觀念，那更糟了。尤其是那些已經公開發表了自己的著作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話是多餘的，就更是太不光彩了！這種情形，在人文科學（包括哲學、文學、史學、政治學、經濟學、藝術、音樂等等）方面，尤為嚴重。因其於人類進化之過程中，累積量太多，後生之創造力則顯得越小。就拿中國來說吧，東周的時代，孔夫子寫文章，抄別人的少，說自己的多，一部「論語」（K·P知道不是孔子自己寫的）中，古人的觀念不多，古人的話也不多，就算全是古人的觀念，但那時候古人也有限，「言必稱周公，言必稱文、武」而宗於「三代」（兼及唐虞，夫子「述而不作」）。所以，賈寶玉認為「論語不是杜撰的」（參考「紅樓夢」第三回），其實，在K·P用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來分析，「論語」也是「杜」來的。可是，中國文化每下愈況，歷史太久，抄的愈多，撰的也愈狠！後來的人，除了孔子述的那些人之外，還得述上，孟、老、莊、韓、柳、歐、曾……等等「縱橫五千年，旁及泰西古埃及」。所以，時至今日，才俊之士，言及「人文」，無一不抄，無一不撰，無一不「剪刀漿糊」，這一點，平心而論，連K·P和李敖都沒有例外！這是一九七〇年代「人文科學」的恥辱，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然而可喜的是，洋鬼子和東洋鬼子也沒有逃過此一運數。他們

爲這種「抄襲」找到了藉口，名之曰：「知識爆炸」。在知識爆炸的情形下，抄襲之罪便減了一等，所以，K·P寫文章，雖然免不了抄古人，也就問心無愧了。因爲，K·P在「抄」的時候，有兩個原則；一，「抄」該抄的，「不抄」不該抄的；二，「抄」古人之目的絕不是爲了要「唬」現代人，讓年輕人誤以爲不是抄的而是新發明的。這個動機，全然是純潔的。本人以十二萬分的誠懇，把這個觀念提供給同時代的「另一位」偉大的寫文章者做借鏡，這種與人爲善的動機，絕不是一般善男信女捐五斗白米賑濟老危病患的那種婆婆媽媽的「菩薩」心腸，而是一種「知識份子」尋回理想的高尚情操。我這樣做，即使是遭人誤解，亦在所不惜，而且是不尤不怨的。正如耶穌基督在各各他山丘的最後那句格言；「父啊！饒恕他們，因爲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

從現在開始，我要言歸正傳了。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是十全十美的嗎？我敢肯定地說；「不是」。

我們不該檢討我們自己的傳統？當然；「是的」。

問題是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檢討？而我們檢討中國文化的指標又是什麼？

我這樣說，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不會反對我，而四十五歲以下的中國人也絕不會不同

意我。因爲全中國人都不是頭腦不清的傻子。所以，我一開始寫這本書，就已經做了一個假設，那就是，中國人，尤其是看了我這本書的人，絕不會受騙。

比較進步的史學方法，已經摒棄了整理相關資料以證實一種特定現象的是非從而建立某種概念。即使是對歷史現象的批評，也是個別性的，因爲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任何一件事實，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生活方式、大多數人的知識水準……有密切的關聯性。所以，進步的歷史學家在處理歷史資料時，必然十分謹慎。

所以，在合理的評論下，史學家大多以斷代的方式去衡量歷史事件，例如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保守的歷史學家從一八六〇年林肯當選總統說到一八六五年林肯被刺爲止，大手筆的史學家可能從一八四〇年經濟不景氣說到一八八四年民主黨重獲政權爲止，這已經很長，長得叫人受不了了。誰會一口氣把美國南北戰爭的前因後果從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算起，直說到一九八〇年阿富汗事件呢？拿我國的「五四運動」而言，保守的人說一九一七年中國對德宣戰，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國不能收回山東之德國租借地，到一九二二年美國首都的「九國公約」解決了山東問題，這是「五四運動」的時代，也就是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戰場」，爭奪的是「山東主權」。大膽的說法則從一八四〇年中、英戰事

算起，也只能算到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因為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的中西文化論戰和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也已經包括在內了，這不是很廣泛了嗎？就「五四」所爭的實質而牽涉到文化的過程，但絕不能說「五四」就是上引三皇五帝，下接萬代子孫的連續運動，這不是史學系出身的人討論歷史事件的正常標準。

另外，做爲一個討論歷史事件的人，他一定重視某一事件發生的當時的社會條件。例如；我們提到希臘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當然會聯想到希臘的「城邦政治」，我們提到「井田制度」，一定得想到「分封」與「宗法」制度，這個觀念很容易爲人接受。如果我們把話題擴大年限，自然「唐明皇與太乙真人」，就可以建立起一個獨特的「宇宙論」可是，我很懷疑，這種文章的說理能力究竟有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化有時間性、空間性，在特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內所產生的事件，其影響必有一定的程度。這絕不是K·P「小鼻子小眼睛」說「小話」，這是合理討論問題的正常方法。

終於，有人可以吹噓本人的缺點了。只要提出孔夫子影響中國文化二千餘年，耶穌基督操縱洋鬼子一千九百六十多年（耶穌二十多歲開始宣揚福音，收了十三個門徒）便可以證明

歷史事件的連鎖性和延續性，證明現代人的一切缺失得自於祖宗八代。這種說法，是經不起分析的。因為文化的連鎖性和變動性都是文化推移的原動力，累積文明而成文化，當然後生之思想行為無法不承接前人之行為餘緒。否則，每一代之人類皆停滯於亞當夏娃的「樂園」裡，又豈是耶和華之願望？歷史學的原則告訴我們，人類之一切「社會行為」，沒有不是前代「遺傳」之結果，也絕對沒有完全能與前代相雷同者。也就是說，每一時代人的「社會行為」都有別於前一代人，只是差距的大小而已，絕不可能完全相同。拿美國來說，二百年的歷史，二十世紀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十八世紀的美國人很不一樣。而中華民國一九一二年到今天（一九八〇年），六十九年的時間並不太長，但是我們這一代的青年人和「老夫子」一代的人就不很一樣了，而且差異相當大。思想成熟的歷史學家，並不太強調前人之錯誤乃是後人愚笨的原因，或者說現代人的錯誤是古代人留下來的餘毒。不必，根本就不必如此武斷，我們可以很樂觀的繼續前進，進步，再進步。例如：產業革命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同時也是工業化社會病害的緣起，但是這些病害可以除去，而不必歸罪於產業革命。從瓦特（James Watt 1736—1819）發明蒸汽機和史密·亞當（Smith Adam 1733—1790）出版「富國論」（1776年）到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的新資本主義都可證明前人的理

論後人皆能刪改而發揚光大之。拿我們中國來說，也正是如此，例如：孔老夫子被一九七九年的李敖先生「獨白」了一陣，很不好看，可是孔夫子的儒家思想在一八五〇到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中挽救了中華民族億萬子孫正常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是事實。而這些事實有其適用於現代或不適用現社會的因素。因此，歷史學家在評論史實的時候，一定得注意當時的社會背景……用現代人的觀念去看古代人爲什麼不在結婚證書上簽字蓋章，收了一大堆史料，結論是古代人通通沒有正式結婚，所以，現代人全是古代人的「私生子」，如此一來，豈不誤盡天下之蒼生也者哉！

我們如果能夠接受這種概念，自然便不會以「北京人」赤身露體爲恥，不會以孔夫子不會用原子筆寫文章爲恥，不會譏笑楊貴妃沒汽車坐爲可悲。當然，也就不會追問古代人爲什麼「三從四德」的觀念那麼強烈？宋、明之科舉考試何以沒有考物理、化學？因爲我們認可歷史演進的各時代的文明差異是合理的。我們今天在面對這些「文化差異」的時候，一定要冷靜，一定要理智。在討論事實的時候，需要講究客觀的方法和主觀的指標。

爲什麼呢？

因爲「客觀的方法」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分辨歷史的是非曲直和文化遞變的常軌。而「主

「觀的指標」可以使我們的討論工作具有建設性，而有益於我們這一代人和下一代……億萬代子孫的生存。雖然，我的論調十分「功利」，這也無可奈何，因為，歷史不能建設歷史，文化不能創造文化，則所有的論點都將成爲空洞。從哲學的立場看來，大家都公認「玄想」本身也是一種創造，更何況既成的「歷史」以及人類缺少不得的文化觀念呢？

所以；我們在討論「古人」的時候，就不能不提出一套客觀而具有建設性的方法，即使是自說自話，也得透過社會大多數人的共同意識，而絕不可以一味「獨白」。說到這裡，我不希望任何人誤解我是在提倡「文以載道」，因為這種理論，已經不稀奇，也不包括全中國人寫文章的必然途徑。我只是要說明一點，那就是任何人的「獨白」，其目的單純只是「獨白」，爲「獨白」而「獨白」，也可以。如果，任何人的「獨白」，使人覺得他的動機在於塑造一種希望大多數人（少部分人也無妨）認同的理想時，這種「獨白」除了叫人「大呼痛快」，「心有戚戚」之外，還得有建設性。思想進步的知識份子（包括老夫子和小孩子）都承認文學爲文學而存在，文學不可附庸於宗教或政治。藝術本身就是藝術，藝術絕不可以依存於道德或者商業。這種理論完全正確，因其爲文學的發展、藝術的進步提供了生存的保障，使文學和藝術的演進可以更爲生動活躍而前途無量。所以大多數知識份子都接受了這種觀念的